古希腊哲学中人学思想初探

雷 红 霞

对希腊人学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较为少见。本文在这方面作了初步探讨。文中概述了西方人学从理性人学到宗教人学再到理性人学的发展,论述了古代理性人学的内容和实质,说明了斯多葛派人学的神化,标志着向中世纪宗教人学的转化,挖掘了古代各种人性思想(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先验性)的萌芽及其发展。这项研究对于探索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规律,弄清哲学与人学的关系,正确理解人性和人的本质,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具有重要意义。

“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始终为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所困惑、探索。可以说,人学问题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人学研究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它大致经历了理性人学(古代)——宗教人学(中世纪)——理性人学(文艺复兴至近代)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①,其后马克思主义人学则向社会性、实践性方面发展,现代西方人学则向非理性、个体性方面发展。研究古希腊人学对于探索整个西方人学思想及其规律,对于弄清人学思想与哲学理论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人性和人的本质,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性人学的确立——人是一个求知求真的理性存在者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说: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正是这种强烈的奇异感驱使着古代哲人开始了对人自身的探究。

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就标志着它摆脱了宗教神话的束缚,开始清醒地面对令古人畏惧的自然,探讨自然的本质,并趋向自然本体论。^②这一自然本体论深刻地影响着古代哲人对人自身的认识,并导致理性人学的产生。他们往往以客观外在的本体及规律来解释人,强调人对自然本体的认知与服从,把人解释为一种求知求真的理性存在者,而求得的真即是善,善即是真,以真为基础,真、善、美三者合而为一。赫拉克利特说:“每一个人都能认识自己,都能明智”^③。而智慧就在于认识与服从火的运行规律“逻各斯”,“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④在他看来,“逻各斯”主宰一切,它既统治着自然界,又统治着人类社会生活,既以必然性驾驭着自然秩序,又以“命运”支配着人的灵魂、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这个“逻各斯”如同黑格尔所理解的就是“理性的规律”,人们只有认识它,服从它,按它行事,才是智慧的,才能避恶趋善。这里他已把人看作一个求真求知、获得智慧的理性存在者,标志着理性人学的产生。德谟克利特也认为,原子及其运动的必然规律,产生并决定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一切。人的

灵魂就是理性，人生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当理性灵魂认识了原子及其必然性规律，就能平静、安泰地生活，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扰，达到幸福的善的境界^⑧，也就是说，理性对本体的真即是善。随后的伊壁鸠鲁更清楚地指出，人的理性的“审慎”是最大的善，它是使人们认识自然本体及规律和人自身的能力，并能指示人们达到幸福生活目的的美德^⑨。（在此伊氏最大的善即是理性对本体规律的真，真也就是善，真善美合而为一）“凡是被判定为最好的行为，都是遵从理性正当地作成的”^⑩，由此，按理性行事，具备明智、审慎的理性的人，就是伊壁鸠鲁心目中理想的人格。

被誉为西方人本主义始祖的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重要命题，使哲学研究由客体自然转向了主体的人。而苏格拉底的人同样是一个求知、求真的理性存在者，他所谓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告诫人们，注意智慧、真理和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⑪，认识人的理性心灵中先天存在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如勇敢、正义、节制等，一旦人们通过归纳获得了这些道德观念的知识，便拥有了一个智慧的灵魂，灵魂“在智慧的指导之下，结局就是幸福；但如果在愚蠢的指导之下，则结局就相反”^⑫，智慧知识即是善、幸福及美德，愚昧无知即是恶、痛苦及丑行，于是“美德即知识”，善即是真，真即是善，一个真善美的完人实质上是一个拥有真知与智慧的理性的人。继老师之后，柏拉图提出了人的灵魂结构说，把灵魂分成三部分：理性、意志和情欲，即知、意、情；理性最高起统帅作用，意志次之，情欲最低。当理性摆脱肉体战胜情欲，认识了最高的知识善的理念时，就进入了人生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此，人生的真实意义和全部价值就在于：人是一个求真的理性存在者，真善美的统一了实质上是以求取真知、获得智慧为基础与内容的。

古希腊人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虽力图全面完整地理解人，但同样明确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强调理性为人类所独有，它是灵魂中较高较优的部分，操修理性而运用思想正是人生至高的目的^⑬。“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⑭至此，理性人学的思想已被明白无误地阐发出来。

尽管古希腊哲人都主张理性的人学，但作为理性的人所追求的人生目的至善的内涵则不同，一般说来，主张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哲人，其至善是指现实的幸福，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虽是矛盾的，但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使他持同样的主张，并与柏拉图相对）；主张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哲人，其至善是指超验的、神秘的理念，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向宗教人学的转化——斯多葛派人学的神化

随着希腊奴隶制的衰落，哲学也随之衰落了。由于哲人们不再关切对本体的真知，而转向伦理道德问题，导致求真求知的理性人学开始向宗教人学的转化，斯多葛派的人学恰好反映了这种转化。

斯多葛派利用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宣称世界源于火，一切受“逻各斯”决定，并将“逻各斯”作了意义的转换，称它是神圣的火的理性即世界理性，也就是神、天道、命运、必然性（注意：这些概念在斯派这里是同一意思）。“逻各斯”的这一神化，便标志着理性人学转向了宗教人学。既然神圣的“逻各斯”决定一切包括人，那么人的理性便源于神，是神的理性的一火花，个人的本性都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在此人的理性全然神性化了，人从属于神，只有按神即世界理性行事才是美德，人生的目的至善，就是过一种顺应自然服从命运的生活，即按照神亦即世界理性，也是按照一个人自己的本性来生活^⑮，因为人在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仅能分给每一个人的是无限的、不可测的时间中的极少的一部分，是无限大的宇宙空间的一小块土壤，想到这

一切,就要认定,除了按照人的本性、世界理性即神性去作之外,再没有伟大的事情了^⑧。

后期斯多葛派完全转向了宗教人学,为基督教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人的理性源于神性,是神所赋予的,人自然是一种最高级的存在,是万物之灵,是地球的统治者,但人又须回归于神,达到永恒。如此人生是短暂的过客、风中的残烛、是参拜上帝的旅途,只有听从神意,安于命运,忍受苦难,演好上帝为你安排的角色,才能回归于神,进入天国。这犹如新柏拉图派所描述的,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神秘境界,达到天人合一。这样希腊的理性人学,经斯多葛派、新柏拉图派的演变,最后为宗教人学所取代。人经过中世纪神的千年重压,至文艺复兴时,理性的人才重被发掘,人性的丰富性才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理性人学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获得新的发展。

各种人性思想的萌芽——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先验性

正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哲学丰富多彩,在它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⑨一切近现代哲学思想,不过是对古代哲人提出深奥问题的新回答。尽管理性人学是古希腊人学的主旋律,但同样包含着以后各种人性思想的胚胎、萌芽。古希腊哲人在阐明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同时,也涉及到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先验性等人性思想,发掘这些人性思想的萌芽,便能摸清西方人性思想发展的脉络,把握哲学与人学的关系。

人性的自然性——古代原子论者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其先驱恩培多克勒以自然的四元素说解释一切包括人:“从这些元素中生出一切过去、现在、未来存在的东西,树木,男人女人,……”^⑩。德谟克利特也认为人是由自然的原子所构成,人的本性就是从肉体原子即粗糙的原子和灵魂原子即精细的原子的结合中产生的,这种自然主义人性论的萌芽,经伊壁鸠鲁的继承,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那里,发展为以肉体感受性为基础的人性理论,而费尔巴哈则是这一自然主义人性论的集大成者,较为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的生理属性,但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人性的社会性——苏格拉底与德谟克利特在哲学观点上虽是不同的,但在“知识即美德”的观点上却是一致的,前者强调美德的先验性,但并不否认美德可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后者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说明了后天的教育、环境的影响对一个人的道德品性有重要作用,指出:“本性和教育有某些方面相似:教育很可以改变一个人。”^⑪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人是社会和动物的动物,强调了社会教育与行为实践对形成人的美德的重要作用,“人如果离世绝俗,就无法实践其善行,勇毅、节制、正义、明智诸善德实际上就包含在社会的公务和城邦的活动中”^⑫。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萌芽,以后在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那里,得到系统的论证和发挥。这种社会环境决定人性发展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进步,它不像自然主义人性论,只停留在哲学大厦的下半截(即自然领域),而是在上半截(即社会历史领域)攀登,虽然失败了,它不是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但却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人性的先验性——柏拉图以其唯心主义理念论为基础,阐述了人性的先验性与血统性,把人的本性即灵魂中最优秀部分的理性的智慧,赋予由金子做成的、能认知善的理念的哲学王即统治者;灵魂中的意志的勇敢,赋予由银子做成的、认知理念影子的守卫者;灵魂中最低劣部分的欲望的节制,赋予由铜与铁做成的、认知感性事物的劳动者。这种先验论、血统论是对奴隶主人性论的绝妙的解释。难怪亚里士多德也说:“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

地成为奴隶”^⑨，在他眼里，奴隶仅只是无理性的、会说话的工具，这与德谟克利特所主张的，应该象使用我们身体上的四肢那样来使用奴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他们作为奴隶思想家，由于阶级偏见所带来的理论局限与错误。以后中世纪的宗教人学宣扬人的原罪说，马基雅弗利的性恶论与卢梭的性善论，都是这种先验性人性的鲜明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的几点启示：

1. 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决定、制约着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理性人学到宗教人学再到理性人学的发展粗略再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古代奴隶制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智慧的人，中世纪千年的神学统治，只能造就跪倒在神灵脚下的人，文艺复兴的曙光照亮的近代，需要勇于反对神学信仰，宣扬科学、民主的理性的新人。

2. 哲学思想决定、制约着西方人性思想。哲人的人性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观中。如持人性自然性的哲人，世界观一般是唯物主义的；持人性社会性的哲人，也往往是唯物主义的，或至少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而在每个哲人那里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当然有些哲人，既看到人性的自然性，又看到人性的社会性，如德谟克利特、法国唯物论者）持人性先验性的哲人，也往往是唯心主义的，先验唯心的世界观必将导致先验性的人性思想，但涉及每个哲人则须具体分析。

3.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人学观。抛弃了西方人学研究中那种抽象的理性人学、宗教人学、人的自然性与先验性，将人学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从社会存在、历史发展和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人，为正确理解人性和人的本质，为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注 释：

- ① 理性一词历来难于界定，此处并非指在认识论中与感性相对的理性，而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下，既指与愚昧、迷信相对的理性，又指人们运用概念对世界进行认识、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思维能力。
- ② 雷红霞：《康德哲学革命的意义》，《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 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97、369、369、149、165、328、375、453、84页。
- ⑩⑪⑬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385、388、395、345、16页。
- 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页。
- ⑮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第73页。

（责任编辑 彭昌林）